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



党
银
平
著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从文化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梳理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过程。第二章阐释新罗留学生入唐游学风尚形成的内外原因。第三章探索唐代对新罗留学生的特殊管理方式。第四章考辨唐代是否曾为新罗留学生特设“宾贡”之科。第五章辨析新罗及第进士在唐代的发榜方式。第六章考述新罗留学生与唐代官吏及文士的交往关系，归纳两国文人交游的总体特点。第七章彰显留学生群体在中韩教育关系史上的重要文化意义。第八章阐明唐代与新罗佛教密切而互动共振的交流关系。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

党银平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党银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12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5968-7

I. 唐… II. 党…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
- 中国、朝鲜-唐代 IV. K24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9153 号

书 名 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

著 者 党银平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3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968-7

定 价 29.00 元

序

朝鲜半岛与中国是一衣带水又是陆地毗连的近邻,自古以来,人们大多知道中国和韩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但可能忽略了一件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千百年来,这种交流关系是十分不平衡的:韩国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研究和吸收,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他们的。中国的儒家典籍、文学作品及史学著作等早就源源不断地、船载斗量地被他们搬过去,加以学习、研究、评说,有关的论著成批涌现,浩如烟海。相比之下,我们对韩国文化的关心、介绍、研究、吸收则寥若晨星,凤毛麟角。以曾旅居中国达十六年之久的、历来被韩国尊为“儒学之祖”、“文学之宗”的崔致远来说,在千百年间的中国典籍中也言之者鲜,即便他是一位把青春年华消耗在晚唐的才气横溢的文章家,我们也仅在言及其留唐诗文集《桂苑笔耕集》时略一提及,缺乏足够的论述和研究。至于韩国的其他人物和重大事件,如旅居中国元朝长达 26 年的高丽政治家、大词人李齐贤,如 16 世纪朝鲜抗击倭人入侵对中国安全的贡献等等,除专门以韩国古代文史哲为研究对象的少数学者冷冷清清地有所言及外,一般都较少关心和过问,更谈不上详为介绍,深加研究了。

两国交流中的这种巨大落差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说来话长,这里就不细讲了。这半个世纪以来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令人耳目一新,顿觉豁然开朗的是中韩建交的这十五年来形成的新局面。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阔步猛进,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对韩国的关注有了重大的进

展和划时代的变化。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韩国,韩国语言的学习者猛增,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备受公众欢迎,甚至于出现了“韩流”这样新奇的名词和现象。韩国文化对中国的这种“冲击波”确实是在堆积如山的中国历代史册中难以找到的。“文化交流”者,相互你来我往也,如今此种情形虽有姗姗来迟之感,却特别使人高兴,尤其像我这种以韩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为专职的人,更觉欣慰。

还应该讲明的是,近若干年来,中国连素不识韩国语言的学者也加入到了韩国文学研究的行列中来,而且作出了特有的成就,这在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中是罕见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韩国古典文献极大多数是用古代汉文写成的,这很有利于中国人开展韩国古代文化研究。

党银平先生近期成书的专著《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是作者在《崔致远研究》基础上发端而形成的一项研究成果。

我和党银平先生相识是在大约四、五年前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开展崔致远研究的小型碰头会上。他出身于南京大学,由于崔致远与南京的地缘关系,他在读博士研究生时,就在其导师周勋初与莫砺锋两位教授的鼓励支持下,选定了崔致远作为研究对象,成年累月埋头于中韩各类典籍和有关的大量论著、资料中,去伪存真,分析辨证,做出了很扎实的成就,如今又在其已有的基础上,拓宽到目前这个主题,这项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中韩学术界在此领域中的空隙和不足之处。

党银平先生此著学术严谨,言必有据,旁征博引,论述具体翔实。对于韩国历史早期最卓越著名的诗人、文章家崔致远,朝鲜半岛南北和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类《韩国文学史》、《朝鲜文学史》等皆以之为首要的文学家,特辟专节加以论述,但是对于奠定了崔致远一生事业基础的留唐经历,却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误传。对于反映他在唐代重要时期(淮南幕府)光阴怎样度过的唯一传世文集《桂苑笔耕集》,或数语带

过,或只取其若干诗作加以发挥、评论,多数没有作细致的质疑或论述。而党银平先生的研究则特别着力于扎实的考证,在客观材料所能提供的信息与线索的最大限度内,对崔致远等众多新罗游学唐朝文士在华学习、应举、为官、交游,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如唐代留学生的教育管理、科举和新罗留学生回国后在政治、教育、宗教上的作用与贡献等等情况,方方面面,做了质疑、考察、剖析、论证,实实在在,丰赡可信,很少使人有泛而不实和论断欠妥切之感。

此一专著内容不限于崔致远本身,但其所有的论述都十分有利于了解崔致远。我相信只要是关心唐代与新罗文化关系或崔致远的学人都会对此书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会感到读有所获,不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

笔者十一年前有感于学术状况和实际需要,曾两度赴溧水、高淳、扬州对崔致远行迹试作考察。其后每睹党银平之文,总联想起曾经得到过当地人士如吴大林、濮阳康京、王勤金、唐根兴等先生^①的热情配合和协助。党银平现在供职于南京师范大学,与他们同为身居江苏的有心人,耕之耘之,仅仅数年,而成就斐然。长江后浪推前浪,他长时期的潜心研究和探索,也补正了我的不足,使我觉得分外可喜、可贺。

谨此为序。

韦旭升

2007年5月7日于北京昌平区暂栖斋

^① 吴、濮阳、王其时为当地文物考古机构负责人,唐为扬州市教育局前副局长。

目 录

序	韦旭升 1
绪 论	1
第一章 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5
第一节 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	5
第二节 新罗文化教育的发展	14
第二章 新罗“西学”教育风尚盛行的原因	19
第一节 新罗“西学”的文化涵义	19
第二节 新罗“西学”风尚盛行的原因	21
第三章 唐代新罗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	30
第一节 新罗派遣赴唐留学生的时间	30
第二节 新罗留学生的入唐程序与人数	32
第三节 新罗留学生的习业场所与生活待遇	36
第四节 新罗留学生的留唐年限及归国程序	41
第四章 新罗留学生与唐代科举	47
第一节 “宾贡”的涵义及其演变	47
第二节 唐代有无“宾贡科”考论	51
第三节 唐代新罗留学生的应试方式	57
第五章 新罗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与相关事迹	61
第一节 新罗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	61

第二节 新罗留唐进士事迹补正	66
第六章 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交往	79
第一节 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人交往的特点	79
第二节 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诗歌交往	82
第三节 新罗留学生崔致远与唐末文人的交往	99
第四节 新罗留学生崔致远与淮南节度使高骈的交往	118
第七章 新罗留唐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	133
第一节 新罗留学生对本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贡献	133
第二节 新罗留学生对汉文学发展的作用	147
第八章 唐代与新罗的佛教文化关系	163
第一节 新罗佛教与唐代佛教的师承关系	163
第二节 唐代文士与新罗僧侣的交游	191
结 语	206
主要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12

绪 论

新罗是与唐代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海东邻邦,向来享有“君子之国”、“文献之邦”和“小中华”的美誉。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中,两国间除了频繁的政治、军事、经济往来外,还有着十分紧密的文化教育互动关系,新罗的典章制度、思想学术、文学艺术与宗教思想等都受到了这种教育关系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由于唐代实行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振兴国学,增加学舍,扩大生源,崇尚科举取士,形成了海纳百川、气度恢弘的教育格局,也制定了对外教育的特殊管理体制,这对周边的藩国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吸引力。当时朝鲜半岛的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鼓励本国学子与僧徒入唐游学巡礼。新罗作为与唐代关系最为敦睦的邻国,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就开始不断派遣大批的“宿卫学生”(留学生)入唐学习汉文化,最终成为有唐一代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这些留学生游学中原,成为参与唐代科举的重要群体,其中荣登唐代进士科榜者亦屡见不鲜,留下了中韩文化关系史上值得称道的佳话。新罗留学生因为久居中华,饱受中国文化的丰厚滋养与熏陶,不但对中国的经籍典制、礼仪风俗、文学艺术及教育制度等有直观的感受和全面的了解,也深受中国儒学、佛教及道教思想的濡染浸润,留学生群体返国后多身居朝廷或地方要职,对新罗政典的制定、文化的建设、教育的改革及学术思想的繁荣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对中国传统的诗、文、赋及其它艺术形式皆有很高的造诣,留唐期间与唐代文人诗客

交游频繁,彼此以诗文酬酢,唱和切磋,以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了丰富而优秀的汉文、汉诗、汉赋与小说作品,成为中国与韩国文学史中共同拥有的重要的文学遗产。因而,研究唐代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在中韩教育史、科举史、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文化学术价值。

关于新罗与唐代的教育关系研究,韩国学术界关注较早,对这类课题的研究也比较重视,迄今已产生了不少相关的论著,如李基东的《新罗下代宾贡及第者的出现与唐罗文人的交欢》(《全海宗博士花甲纪念论丛》,韩国一潮阁 1979 年版)、金世润的《新罗下代渡唐留学生》(《韩国史研究》1982 年第 37 期)、李基东的《九世纪罗唐文人的交游》(《朝鲜史通讯》1984 年第 4 期)、赵润济的《韩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张珽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等,都尝试从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士交往关系的角度展开探索,或者从韩国历史发展及文学史的纵向层面进行宏观上的描述。

相对而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成果也不丰,早期仅有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9 年《唐史研究丛稿》)一文和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 年版)、《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1 年版)两书,曾对唐代与新罗文士的关系作出过梳理,学术上已经有了拓荒之功。近年来相继出版的研究唐代科举史的著作,如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阎文儒《唐代贡举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李才栋《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王炳照、徐勇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4 年

版)等,考释论述的视点主要侧重于唐代自身的教育或科举情况,对唐代与域外的教育交流关系一般很少涉及。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韩文化交流的复兴与加强,中韩之间的相关学术研究日益兴盛,唐代与新罗的文化关系也逐渐引起许多中国学者的重视,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交流史著作或相关研究专著,如杨通方的《中韩文化交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蒋非非、王小甫等所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杨昭全、何彤梅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 1997 年版),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高明士的《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等书,已开始在此领域作出了可贵的学术探索。总体上说,这些著作视野宏通,博洽厚实,线索清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有的著作对唐代与新罗的教育关系仅仅作出了简短的介绍,有的则在中外关系史或中韩关系史的大背景下附带论述了两国的教育交往概况,目前还没有以唐代与新罗文化教育关系作为专门研究的专著。

有鉴于此,本书拟根据现存有关中韩文献,结合学界前贤的研究成果,尝试对唐代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展开较为整体集中的考述。全书由八章组成。第一章从文化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梳理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过程。第二章由界定新罗“西学”概念内涵的视角切入,阐释新罗入唐游学风尚形成的内外原因。第三章探索唐代对新罗留学生的特殊管理方式,主要从三个层面论述新罗留学生入唐的程序与人数、习业场所与生活待遇、留唐年限与归国方式。第四章以唐代科举为中心,厘清唐代“宾贡”的类别指向,由此考辨唐代是否曾为新罗留学生特设“宾贡”之科。第五章重点辨析新罗及第进士在唐代的发榜方式,大致说明新罗留唐进士的人数与姓名。第六章考述新罗留学生与唐代官吏及文士的交往关系,归纳两国文人交游的总体特

点。第七章从政治体制、思想建设、文学发展等角度强调新罗留学生在本国历史文化中的突出作用,彰显留学生群体在中韩教育关系史上的重要文化意义。第八章主要通过梳理新罗佛教与唐代佛教的师承渊源,新罗僧侣与唐代高僧文士的交游,藉以说明唐代与新罗佛教密切而互动共振的交流关系。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很重视以现存中韩原始文献为立说依据,注意吸纳学术界前贤今人的已有观点,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探赜比勘和对前人异说的辨析综考,尝试对唐代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作出较为全面而客观的勾勒与评述。全书既有两国教育交流格局的宏观阐述,也有许多具体个案的考释,力求以不尚空言的实证方法,从儒学、宗教、文学等综合层面来探索并说明唐代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

第一章 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新罗自朴赫居世建国开始,共经历了五十六代、九百余年的历史,向来被誉为海东“文献之邦”和“君子之国”。新罗文化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进过程,其中,与唐王朝频繁而密切的文化教育交流是促进新罗教育发展相当重要的阶段。下面拟从历史现状与发展过程两个层面对此略作梳理。

第一节 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

新罗又称徐罗伐、鸡林及新(斯)卢等,其地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原为上古辰韩十二国中的斯卢国。据中国史书《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及两《唐书》之《新罗传》等记载,新罗最早是由三韩(辰韩、弁韩、马韩)之一的辰韩部落发展而来。辰韩部族主要散居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及洛东江东侧一带的山谷间,繁衍生息,后来逐渐在今庆州附近形成六座大的村墟。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记载了六村的分布地域与名称:

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阙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或六千珍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①。

^① 《三国史记》卷一,韩国明文堂1988年版,第40页。



突山高墟村长苏伐都利纪迹碑

传说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六村之祖(阙川杨山村之祖谒平、突山高墟村之祖苏伐都利、茂山大树村之祖俱(一作“仇”)礼马、觜山珍支村之祖智伯虎、金山加利村之祖祇沱(一作“只他”)、明活山高耶村之祖虎珍)各率族人汇集于阙川之岸,共同推尊十三岁的朴赫居世为“居西干(王)”,在庆州建立了最早的国家“徐罗伐”《《三国史记》卷一《新罗

本纪第一》)。朝鲜文人姜再恒(1689—1756)在《东史评证·三国国号》中说:

新罗或称斯卢,或称徐罗伐,斯卢本辰韩所统小国名,徐罗伐,坪名,罗人以坪为伐,后转以为新罗(至今东人以京城为徐伐,犹中国人以帝都为京师)。高句丽亦小国名,入汉为玄菟郡所统属县,高朱蒙起于其地,因以为国号。百济亦马韩所统伯济小国名,伯百同音,古多通用,高温祚起于其地,亦因以为国号。盖三国各因所起之地以为名号,无意义也^①。

新罗虽然在公元前就已立国,但国家形态并不完备,基本保留了早期原始部落联盟的社会特点,朴、昔、金三姓相继称王(第一代为居

^① 《立斋遗稿》卷九《杂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10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

西干,第二代起为次次雄,第三代起称尼师今,第十九代起称麻立干),三姓始祖皆为卵生,都带有非常浓郁的神话灵异色彩,如“次次雄”在新罗方言中指负责祭祀的巫师,说明新罗早期巫术巫风较为流行。

辰韩六村的族民也主要从事简朴的农耕生活,生产力低下,没有文字,“刻木为信”,也无姓氏,尚停留在落后的原始部落状态。据《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记载,至儒理王九年(32),六村居民始有姓氏:

(儒理王奈师今)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仍赐姓,杨山部为梁部,姓李;高墟部为沙梁部,姓崔;大树部为渐梁部(一云牟梁),姓孙;于(当作“干”)珍部为本彼部,姓郑;加利部为汉祗部,姓裴;明活部为习比部,姓薛^①。

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卷一也记载了六村的分布地域和名称渊源,但六村之姓则稍有出入(沙梁部姓郑,本彼部姓崔)^②。事实上,新罗最早的姓始于王族朴、昔、金三姓,“辰韩六村”称姓较晚,《新唐书·新罗传》即载新罗:“王姓金,贵人姓朴,民无氏有名。”^③所谓“六村之祖”谒平、苏伐都利、俱(一作“仇”)礼马、智伯虎、只他(或作“祗沱”)、虎珍,“似皆从天而降”^④,在当时并无姓氏。从考古发现的新罗真兴王(540—576)时期的北汉山碑(555,汉城北汉山碑峰)、冒宁碑(561,今庆尚南道昌宁邑)、黄草岭碑(咸兴黄草岭)、摩云岭碑(568,咸南利原),真智王(576—579)时期的塢作碑(在今大邱),真平王(579—632)时期的南山新城碑(在今庆州)等看,碑文中虽然刻有许多部(村)名及人名,但这些人之前均无姓氏,说明直到公元七世纪时,六村居民尚

① 《三国史记》卷一,韩国明文堂1988年版,第43页。

② 《三国遗事》卷一《新罗始祖·赫居世王》,韩国乙酉文化社1992年版,第66—67页。

③ 《新唐书》卷二〇,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20册,第6202页。

④ 《三国遗事》卷一《新罗始祖·赫居世王》,韩国乙酉文化社1992年版,第6页。

未使用姓氏^①。据有关学者考订,新罗六村有姓当在景德王时期(742—765)^②。又有学者认为,儒理王九年所赐李、崔、郑、孙、裴、薛六个汉姓,应该与唐代的名门望族陇西赵郡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荥阳郑氏、乐安孙氏及河东薛氏有很大的关系^③,这说明新罗早期仍以土著文化为主,文化教育还处在一种相对封闭落后的状态。

这种现状要到箕子迁入朝鲜后才有明显的好转。据秦汉大学者伏生《尚书大传》最早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殷太师箕子不愿为周臣,遂率族人五千“走之朝鲜”,约于公元前十三世纪建立箕氏朝鲜。为改变半岛的蛮荒状态,箕子“教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并制定了“八条之教”(《汉书·地理志》)^④,开辟了朝鲜教化礼仪的滥觞,对当时蛮荒的朝鲜风俗起到了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高丽文人权近(1352—1409)《郑三峰道传文集序》称:

吾东方虽在海外,爰自箕子八条之教,俗尚廉耻,文物之懿,人材之作,侔拟中夏,自是以来,世崇文理,设科取士,一遵华制。熏陶化成,垂数百年^⑤。

至秦代时,许多秦人为避秦末苦役而向东迁入朝鲜半岛,以“秦韩”之名逐渐与新罗国民融合为一体(《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汉武帝时又于朝鲜旧地设地方行政机构“四郡”(乐浪、临屯、真番、玄菟),中原比较先进的文化习俗、服饰物产等也很快随之传到朝鲜半岛

① 参阅牟元桂《韩国姓氏源流考》,《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卷),杭州大学,1997年。

② 参见千麟基《漫谈朝鲜人的姓氏》,《环球》1986年第4期。

③ 刘伯骥《唐代政教史》第三章“对高丽之影响”二“新罗”引日本稻叶岩吉《朝鲜文化史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5页。

④ 朝鲜·姜再恒(1689—1756)《立斋遗稿》卷九《杂著·东史评证》:“按八条云者,恐八政字之误也。”

⑤ 《阳村集》卷一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171页。

和新罗。

严格地说,新罗在公元 500 年前后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统一朝鲜半岛之前,新罗的国土疆域不大,人口稀少,与北部的高句丽和西南部的百济等国相比,距离中原最远,交通最不方便,在三国中接受中原文明的时间也最晚。

以佛教东传为例,高句丽接受佛法的时间最早,《三国史记》卷一八称小兽林王二年(372),前秦苻坚便派高僧顺道赴半岛赠送佛经、佛像,翌年高句丽建肖门寺以安置顺道;两年后,东晋僧阿道又前往讲经,高句丽又筑伊佛兰寺以供驻锡。公元 384 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赴百济,次年二月,百济“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而佛教传入新罗的时间最晚,实圣王(金实圣,402—417)时,高句丽僧正方到新罗传教,却被视为异端而遭处死。讷祇王(金讷祇)二十八年(444),佛僧墨胡子自高句丽至新罗一善郡秘传佛教,遭到众多臣僚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佛教未能盛行于新罗。直到法兴王(金原宗)十五年(528),因小臣异次顿舍身殉法,新罗才正式承认佛教。

再以儒学东渐为例,三国中最先接受儒学的亦为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高句丽便模仿东晋体制在中央设立了儒学教育机构“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招收王族和贵族子弟,传授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兼习《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四史;地方上则设立普通教育场所“庠堂”,以普及和弘扬儒家学说。百济的情况也与此略同。新罗至三世纪中叶,汉文字虽然已开始流行,但至三世纪末,新罗才开始接受儒家学说。智证王(智大路)四年(503)改国名为新罗,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然而儒学并未取得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在新罗统一以前,国家统治思想和人才教育选拔制度主要是花郎道。

花郎道又称风流道、风月道,其郎徒被称为源花、风月主、国仙、仙郎等,是新罗以太阳神和天神为信仰的本土型自然宗教。据《三国史记》卷